

---

---

# 袁崇煥選用遼東明軍及建設騎兵研究<sup>\*</sup>

袁展聰

明愛專上學院人文及語言學院

---

---

過往有關袁崇煥在軍事方面貢獻的研究，大多集中分析袁氏的思想策略，少有注意其統領的部隊。薩爾滸之戰慘敗後，明軍接連失去瀋陽、遼陽及廣寧等重要據點。天啟二年（1626）起，袁崇煥前往遼東效力，初時主張起用其親屬及同省人士組建軍隊。然而在寧遠之戰後，袁崇煥明確提出以遼東人組軍，更在崇禎元年（1628）上任薊遼督師後，大力建設騎兵，使其成為遼東明軍的主力。本文將追述袁崇煥如何整建遼東明軍，並說明當中變化。

**關鍵詞：**晚明 騎兵 車營 遼東 袁崇煥

袁崇煥選用遼東明軍及建設騎兵研究

---

<sup>\*</sup> 論文修改期間，蒙《饒宗頤國學院院刊》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意見，謹此再表謝忱。

## 一、導言

袁崇煥（1584–1630）曾經在寧遠之戰和寧錦之戰，兩次打敗後金（1616–1636），引來不少學者研究其軍事思想。過往有關袁崇煥在軍事方面貢獻的研究，大多集中討論袁氏的軍事思想，較少注意當中變化。專論袁崇煥戰術者，如孫文良、李治亭認為袁崇煥固守遼西、進而恢復遼東的戰略，即主守而後戰、用遼人守遼土、憑堅城用大炮的戰術，在當時有巨大的軍事和政治意義，但戰略局部布置有餘，全局不足。<sup>1</sup> 黃國強、譚紅兒、馬社香、張中政均撰文研究袁崇煥的軍事思想，肯定袁氏構築了堅固的寧錦防線，但對其建軍思想的討論，都是以「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交代。<sup>2</sup>

近年，學者們深入研究晚明軍事史，逐漸注意到技術和戰術對歷史的影響，在紅夷大炮和戰車上都有相關論述。<sup>3</sup> 袁崇煥曾經受孫承宗（1563–1638）提攜，而孫承宗出任遼東經略期間，曾大力訓練車營。作為後任者的袁崇煥是如何看待車營？又有何調整和作為？對於遼東戰局又有何影響？可惜至今探討不多。自1980年代起，學界在研究明清兩代軍事史時，往往注意明、後金／清兩方對火炮技術的吸收和應用，如何影響戰爭的勝負。馬楚堅認為袁崇煥使用火炮扭轉明金戰爭態勢，而後金得到西洋火炮後，又消除對明

- 
- 1 孫文良、李治亭：〈論袁崇煥的軍事思想〉，收入廣西桂苑書林叢書編輯委員會：《袁崇煥研究論文集》（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頁165–191。
  - 2 黃國強、譚紅兒：〈論袁崇煥的軍事思想與指揮才能〉，收入廣西桂苑書林叢書編輯委員會：《袁崇煥研究論文集》，頁192–205。張中政：〈民族英雄袁崇煥軍事思想芻議〉，收入廣西桂苑書林叢書編輯委員會：《袁崇煥研究論文集》，頁165–232；馬社香：〈試論袁崇煥在遼東的軍事改革〉，收入廣西桂苑書林叢書編輯委員會：《袁崇煥研究論文集》，頁206–218；張中政：〈民族英雄袁崇煥軍事思想芻議〉，收入廣西桂苑書林叢書編輯委員會：《袁崇煥研究論文集》，頁219–232。
  - 3 黃一農：〈吳橋兵變：明清鼎革的一條重要導火線〉，《清華學報》新42卷第1期（2012年），頁79–133；周維強：〈明代戰車研究〉，（臺灣：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

的部分畏懼，增加攻明的武力。<sup>4</sup> 臺灣學者黃一農亦有多篇論文，分析明朝（1368–1644）在火器原本有領先優勢，但因為遼東的人事關係，特別是孔有德（1602–1652）等人攜帶火炮投降後金，戰局形勢大為轉變。軍事科技的進步誠然會影響戰爭勝負，但戰術改良同樣影響戰局發展。美國學者歐陽泰（Tonio Adam Andrade）在 *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火藥時代——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西歷史的一千年）一書中，指東亞三國（中、日、韓）成功把火槍融入自己部隊，十六世紀東亞地區的軍事文化絕非停滯不前。東亞各國都樂於學習那些由歐洲研發出來的科技，但另一方面各國也會遵循自身的軍事體制和傳統，並從中找尋靈感。<sup>5</sup> 袁崇煥統率的遼東明軍，雖然使用西洋火炮守城，但要收復失地，明軍必須主動出擊。何況，明軍在寧錦之役、廣渠門之戰亦有使用騎兵，袁崇煥如何運用火炮、騎兵，特別是在野戰中對抗後金軍，同樣值得注意。

有見及此，本文將研究重點放在袁崇煥如何選用遼東明軍及整建騎兵的工作上。首先，分析他在選用遼東明軍的轉變；其次，說明由孫承宗建立的遼東車營面對的困境與袁崇煥如何使用騎兵對抗後金軍；最後，再討論袁崇煥如何改革遼東明軍，大力建設騎兵，並指出其於晚明軍事史上有何意義。

4 馬楚堅：〈西洋火炮對明金態勢的改變〉，收入廣西桂苑書林叢書編輯委員會：《袁崇煥研究論文集》，頁 156–182；黃一農：〈明末薩爾滸之役的潰敗與西洋火炮的引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9 本第 3 分（2008 年），頁 377–413；黃一農：〈明清之際紅夷大砲在東南沿海的流布及其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1 本第 4 分（2010 年），頁 769–832；黃一農：〈明清獨特複合金屬砲的興衰〉，《清華學報》新 41 卷第 1 期（2011 年），頁 73–136。

5 Tonio Andrade, *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187；歐陽泰著，陳榮彬譯：《火藥時代——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西歷史的一千年》（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17 年），頁 323。

## 二、袁崇煥在選用遼東明軍上的轉變

天啟二年（1622），袁崇煥主動請纓前往山海關效力，展開軍旅生涯。袁崇煥的軍事思想亦在這刻形成，提倡積極防守。他在選用遼東明軍的思想上發生變化，由最初建議加入廣東、廣西人部隊，引薦親友為將，後期則重用遼人，提倡招募遼東人參軍，並實行屯田。

### （一）建議調用廣東、廣西部隊

萬曆四十六年（1618），努爾哈赤（愛新覺羅努爾哈赤，1559–1626；1616–1626 在位）以「七大恨」告天誓師反明，並於次年（1619）在薩爾滸之戰擊敗明軍。明軍在戰後採取守勢，先後起用熊廷弼（1569–1625）、袁應泰（1621 年卒）和王化貞（1632 年卒）等，除熊氏稍有作為外，其餘都以失敗告終。天啟元年（1621），瀋陽、遼陽相繼失陷，廣寧也在翌年失守，朝野由是大震。同年，王在晉（1643 年卒）出任遼東經略，決定收縮防線，打算在八里鋪（山海關外八里）築重城防守，然而這個建議遭到袁崇煥反對。

袁崇煥能夠實踐自己的軍事主張，與孫承宗的提攜有密切關係。<sup>6</sup> 天啟二年，袁崇煥向首輔奏告，反對王在晉的建議，明廷委派孫承宗巡察，再決定新的軍事布置。孫承宗曾與王在晉，對於在八里鋪築城防守一事，曾有一番爭論，最終雙方都無法說服對方。最終，孫承宗回京，面奏王在晉不勝任，而明廷決定委任孫承宗經略遼東。<sup>7</sup> 孫承宗上任後，徵詢眾人的意見，最終採納袁崇煥更富進取精神的建議，在寧遠築城防守，作為收復遼東的跳板，再修城築堡

6 有關孫承宗與袁崇煥的關係研究，參劉伯涵：〈袁崇煥與孫承宗〉，收入廣西桂苑書林叢書編輯委員會：《袁崇煥研究論文集》，頁 233–247。

7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1 冊，卷二五〇，〈孫承宗傳〉，頁 6467；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十，李清田主編、刁書仁等點校：《先清史料》（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年），頁 262–263；孫文良、李治亭：〈論袁崇煥的軍事思想〉，頁 169–171。

層層推進，逐步收復失地，建立關寧錦防線。<sup>8</sup> 袁崇煥在出關前，曾拜會尚在獄中的熊廷弼，並提出「主守而後戰」的戰略。<sup>9</sup> 而孫承宗決定在寧遠築城，令袁崇煥的軍事主張終於可以實現。

同年，袁崇煥首次說明如何選用軍隊，希望加入來自兩廣的部隊，幫助收復失地。在抵達山海關後，他上疏分析留守遼東的明軍僅能防守邊關，若要發動反攻，必須組建新軍。他在〈急切事宜以圖報稱疏〉說：

若遠圖恢復，非銳卒不可，勢必用廣兵。……惟廣之步兵，勇捷善戰，必不可少。臣向已屬江西，臣叔平樂府推官袁玉佩，見取來京，令其罄將所結納之死士，盡數帶來，併臣之結納，如武舉謝尚政、洪安瀾、湛濯之，候題中書原抱奇，原任典吏洪錫朋、毛胤昌，把總許應國，布衣張時傑、羅大灼，俱能以謀勇宣力。或調舊兵，或招新兵，共成六千，臣叔監之前來，……至廣西之狼兵，雄於天下，衛鋒陷陣，恬不畏死。須於田州調二千，泗城州調二千，龍英州調一千。……見在薊鎮督餉推官林翔鳳，臣之至戚，慷慨知兵，且善武藝，與諸土官交契最厚，可假一京職，往彼催調。<sup>10</sup>

- 8 張廷玉等撰：《明史》，第12冊，卷二五九，〈袁崇煥傳〉，頁6707-6708；閻崇年：〈寧錦防線與寧錦大捷〉，收入氏著：《袁崇煥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頁125-164；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78-79；魏斐德著，陳蘇鎮等譯，閻步克等校：《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68-69。
- 9 葉覺邁修，陳伯陶纂：《東莞縣志》（民國十年鉛印本），卷六十一，〈袁崇煥傳〉，頁1。
- 10 東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編，楊寶霖輯校：《袁崇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卷一，〈急切事宜以圖報稱疏〉，頁1-5。《袁崇煥集》的〈急切事宜以圖報稱疏〉，取自沈國元《兩朝從信錄》，而《兩朝從信錄》鈔錄當時的邱鈔公奏，頗具史料價值。但此疏另有《嶺南遺書》本《袁督師事蹟》、《滄海叢書》本《袁督師遺集》、張次溪《袁督師遺稿遺事彙輯》，它們的說法是「非銳卒，勢必不可用。廣兵：陳九德所帶來水兵三千」，文意與《兩朝從信錄》不同。

袁崇煥在疏中強調用「銳卒」才能收復領土，建議明廷調派廣東步兵、廣西狼兵，組建部隊。值得注意的是，關於袁崇煥的籍貫，根據史籍記載，有廣東東莞、廣西藤縣及平南三種說法，<sup>11</sup> 學者亦有詳細探討，但無論是哪種說法，都可肯定袁氏與廣東、廣西兩省有密切關係。<sup>12</sup> 由此看來，袁崇煥力主使用廣東步兵、廣西狼兵，顯示他更信任同省人士。此外，袁崇煥亦舉薦叔父袁玉佩及有交情的林翔鳳領軍，同樣反映他初出遼東效力時，用人重視鄉親血緣關係。<sup>13</sup> 他更表明：

如廣兵之逃而囂也，臣與叔任其咎；土兵之逃而囂也，林翔鳳任其咎。招之且練之，督之整之而戰，始終臣與臣叔及林翔鳳三人。蓋文臣而躬武將之事，托性命於眾兵之中，圖之必力者。況臣叔官粵、林翔鳳官薊，俱以廉勤見稱，焉敢萬浪作事。他日殲夷得力，如在朝鮮、播州時，必此兩路兵之分明也。他日戰之不力也，即斬臣於軍前，以為輕事者之戒。<sup>14</sup>

袁崇煥對來自兩廣的部隊推崇備至，認為他們足以戰勝後金軍，甚

11 袁崇煥籍貫主要有廣東東莞、廣西藤縣及廣西平南三說。《明史》和《東莞縣志》的記載是廣東東莞、《明季北略》的記載是廣西藤縣、《平南縣志》的記載是廣西平南。參《明史》，第12冊，卷二五九，〈袁崇煥傳〉，頁6707；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上冊，卷二，〈袁崇煥守寧遠〉，頁28；光昭、孫世昌：《潯州府志（道光）》，卷三十四，閻崇年、俞三樂編：《袁崇煥資料集錄》（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下冊，頁177。

12 閻崇年：〈袁崇煥籍貫考辨〉，收入東莞市政協編，羅志歡編選：《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6-10；閻崇年：〈袁崇煥籍貫考〉，收入東莞市政協：《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頁11-16；譚世保：〈袁崇煥籍貫再考辨——對《袁崇煥資料集錄》中有關問題考辨〉，收入東莞市政協：《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頁25-31；譚世寶：〈袁崇煥籍貫補辨〉，收入東莞市政協：《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頁68-74；楊寶霖：〈袁崇煥籍貫考實〉，收入東莞市政協：《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頁46-67。

13 羅炳錦：〈天啟朝袁崇煥人際關係的變化〉，收入東莞市政協：《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頁403-404。

14 《袁崇煥集》，卷一，〈急切事宜以圖報稱疏〉，頁2-3。

至願意以性命擔保，反映袁崇煥初出遼東效力時，特別看重兩廣的部隊。

## （二）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

雖然袁崇煥初出遼東時，力主調用兩廣士兵，但在寧遠之戰後提倡招募遼人參軍，徹底改變組軍方針。

天啟四年（1624），孫承宗上疏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1620–1627 在位）時，提出明軍應該實行「以遼人守遼土」的政策。他說：

凡客兵利速戰，主兵利久守。今關城聚秦、晉、川、湖、齊、梁、燕、趙之眾，盡號客兵，亡論糧料不繼，其即繼也，不遁不譁而坐食，使自坐困。蓋以速戰之備為久守之謀，欲進則不足，久守則必變故。議兵必在土著，然薊甚少，土兵而守遼以內，則遼兵亦客也。故隨遼人之便，安插於兩衛、三所、二十七堡間，以土以屯，曰以遼人守遼土。<sup>15</sup>

孫承宗認為明廷從外地徵調的士兵，耗費大量錢糧，而且他們離開家鄉作戰，容易譁變，難以長久作戰。相反，明軍徵召遼東人入伍，並在遼東屯田，就能做到自給自足。這樣就能減輕明廷的財政負擔，更可以長期作戰，與袁崇煥初期的主張有明顯差別。

然而，「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之策在當時引起爭議。早在孫承宗前，熊廷弼便指「遼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李）永芳不可信」。<sup>16</sup>而袁崇煥在寧遠之戰後提出「以遼人守遼土」的主張，王在晉亦在《三朝遼事實錄》批評：

15 《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本，1984年），第126冊，卷三十九，《熹宗愍皇帝實錄》，頁2251–2252。

16 《明史》，第11冊，卷二五九，〈熊廷弼傳〉，頁6700。

出關用遼人之議決於孫承宗、閻鳴泰，倡其說者孫元化也。遼人如可用，則王化貞、孫元化不駢首於東市矣。<sup>17</sup>

無論是熊廷弼、王在晉都不信任遼東人，認為遼東人會出賣明軍，任用遼東人的將領均自食其果。由此可見，孫承宗、袁崇煥主張選用遼東人參軍，在當時受到不少質疑。

在孫承宗被撤職後，袁崇煥亦主張「以遼人守遼土」。雖然袁崇煥曾建議廣西狼兵，但廣西巡撫何士晉（1625年卒）指當時的狼兵逐漸失去「輕生敢戰」之性，出現不少逃兵。明廷亦下令何士晉與袁玉佩審視情況，再決定是否調兵或酌量調用。<sup>18</sup> 天啟六年（1626），袁崇煥指揮明軍擊退進犯寧遠城的後金軍，並在戰後提出招募遼人為兵。袁崇煥轉而支持「以遼人守遼土」，可能是因為遼東人在寧遠之戰中表現出色。以祖大壽（1656年卒）為例，他雖曾沒有盡力修築寧遠城，但於後來的寧遠、寧錦之戰表現出色，袁崇煥亦稱「寧遠一守一戰，俱大壽冠軍」，對其委以重任。<sup>19</sup> 在〈辭陞職請終制因陳善後事宜疏〉中，袁崇煥批評從外地徵調來遼部隊，「南兵脆弱，西兵善逃」，無法承擔收復失土的重任，所以應該徵召遼東人入伍。<sup>20</sup> 此外，袁崇煥又認為從外地徵調客軍，不利明軍持久作戰，在〈酌度主客軍兵疏〉分析：

乃調到之兵，寧但不能為遼援，而主客不安，先已為遼之擾……使此兵無損於諸邊，有益於遼土，職將厚拓其中，以濟殘邊，無奈其不足倚仗，而已糜盡各邊之物力，自應稍破成議，而放之還，即招遼人以填之。<sup>21</sup>

17 李清田主編，刁書仁等點校：《先清史料》，卷十六，《三朝遼事實錄》，頁402。

18 《明實錄》，第126冊，卷二十一，《熹宗愍皇帝實錄》，頁1050-1051。

19 《明史》，第12冊，卷二五九，〈袁崇煥傳〉，頁6708；袁崇煥：〈關內外總兵設置疏〉，卷二，頁151。

20 《袁崇煥集》，卷一，〈辭陞職請終制因陳善後事宜疏〉，頁16。

21 《袁崇煥集》，卷一，〈酌度主客軍兵疏〉，頁75。



他認為從外地調派的客軍，非但未能幫助作戰，更騷擾遼東本地。明廷調派客軍，只會耗盡當地的人力物力，所以應該撤回客軍，並起用遼東人頂替。兵部尚書馮嘉會（1627年卒）亦認同，直指所調客軍多為貪猾、廢閑之人，「西兵」更是遼東的「流毒」。<sup>22</sup> 雖然袁崇煥在寧錦之役後，曾一度引退，但在崇禎元年（1628）被明思宗（朱由檢，1611-1644；1627-1644在位）重新起用為薊遼督師。思宗在平臺接見袁崇煥時，詢問有關收復遼東的失土。袁崇煥回答：「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sup>23</sup> 在平臺召對中，袁崇煥在解釋方略時，便首先強調「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足見此策已成其復遼戰略中的核心思想。<sup>24</sup>

與此同時，袁崇煥也強調明廷應該在遼東實行屯田，吸引遼東人參軍。天啟六年，袁崇煥上疏指：

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進則因糧於敵，退則寓兵於農。兵家正法，勢必在屯田。……人謂兵安可以為農？臣正謂不能為農者，定不可以為兵。要在上下相通，其耕而穫者，不必在官，不必在私，只地無遺利，人有餘糧。一年餘三年餘食，人得以有其生，始得以有其人，人為我有，而敵不足圖矣。<sup>25</sup>

相較孫承宗，袁崇煥的想法更進一步。屯田不只減輕財政負擔，還可以增加軍隊對明廷的向心力，因為他們的財產都在遼東，會更加拼命殺敵保衛家園。同年，袁崇煥升任遼東巡撫，再次陳述實行屯田的利害，而其中一個好處正是「兵以屯為業，可生則亦可世，久之化客兵為土著，而免徵調之騷擾」。<sup>26</sup> 袁崇煥繼承孫承宗的主張，

22 《袁崇煥集》，卷一，〈兵部尚書馮嘉會覆遼東巡撫袁崇煥疏〉，頁76。

23 《明史》，第12冊，卷二五九，〈袁崇煥傳〉，頁6713。

24 張中政：〈民族英雄袁崇煥軍事思想芻議〉，頁224。

25 《袁崇煥集》，卷一，〈陳屯田題本〉，頁63-64。

26 《袁崇煥集》，卷一，〈陳屯遼地疏〉，頁77-80。

實踐「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招募遼人入伍，確保士兵來源、質素，又組織軍民開墾屯田，解決遼東軍民的糧餉問題。此一政策是由明代前期的軍屯制度發展而來，將當中的經濟意義擴大，與國民生計密切結合，並將軍事意義戰略化，與恢復遼土密切結合，戰鬥性質更強烈。<sup>27</sup>

在出任薊遼督師期間，袁崇煥大力起用遼人為將。崇禎元年，袁崇煥上奏更定山海關外明軍的軍制：

請合寧、錦為一鎮，仍以總兵官祖大壽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綱都督僉事，代梅駐寧遠，而移薊鎮趙率教於關門。……臣自期五年，專借此三人，當與臣相始終。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於司敗。<sup>28</sup>

祖大壽、何可綱（1631年卒）及趙率教（1569–1629）三人，正是袁崇煥在遼東最倚重的三員大將。三員大將中，祖大壽、何可綱都是遼東人，而趙率教雖然是陝西人，但在遼東服役已久。三位都曾參與寧遠、寧錦之役，沒有一位是袁崇煥的同鄉。<sup>29</sup> 當中，祖大壽的地位更是舉足輕重，被袁崇煥稱讚為「遼人復遼，此其首選矣」，其家族子弟在遼東軍中擔任要職。<sup>30</sup> 明、後金雙方都非常重視祖氏家族，而對明廷而言，祖氏勢力是抗擊後金的重要力量。<sup>31</sup> 何可綱則參與更定軍制，使「歲省餉百二十萬有奇」，袁崇煥更稱「其才不在臣下。臣向所建豎，實可綱力」。<sup>32</sup> 趙率教在寧錦之役鎮守錦州達 24

27 劉清陽：〈試論袁崇煥「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政策在明與後金戰爭中的作用〉，收入廣西桂苑書林叢書編輯委員會：《袁崇煥研究論文集》，頁 635–664。

28 《袁崇煥集》，卷二，〈請合寧錦為一鎮疏〉，頁 148。

29 《明史》，第 12 冊，卷二七一，〈趙率教傳〉，頁 6960–6961；《明史》，第 12 冊，卷 271，〈何可綱傳〉，頁 6965–6966；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 年），第 31 冊，卷二三四，〈祖大壽傳〉，頁 9419。

30 《袁崇煥集》，卷二，〈關內外總兵設置疏〉，頁 151。

31 李洵：《下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祖大壽與「祖家將」〉，頁 402–404；葉高樹：〈明清之際遼東的軍事家族——李、毛、祖三家的比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2009 年），頁 121–196。

32 《明史》，第 12 冊，卷二七一，〈何可綱傳〉，頁 6965。

天，戰功昭著。<sup>33</sup> 而袁崇煥此前舉薦的袁玉佩、林翔鳳的構想則沒有實施，兩人都沒有在遼東明軍任職，反映袁崇煥注重選拔具作戰經驗的將官，而非有血緣關係的人。<sup>34</sup>

袁崇煥在整建遼東明軍上，初時雖建議起用兩廣人士。但隨著時間發展，他繼承了孫承宗的思想，力主徵召遼人參軍及實行屯田，並重用遼東人出任軍中要職。

### 三、孫承宗建立遼東車營的困境與袁崇煥使用騎兵

在明清爭奪遼東的戰爭中，明軍的最大優勢就是火炮，更建立車營對抗後金軍，而袁崇煥初出遼東時，亦力主用西洋火炮防守城池。但後金軍改變戰術，袁崇煥於是開始使用騎兵與後金軍交戰，不再困守城池。

展開論述前，有必要先說明明軍的火器優勢。萬曆朝素來被視為明朝滅亡的關鍵，特別是薩爾滸之戰的慘敗，更被認為清朝（1644–1911）立國的奠基石。<sup>35</sup> 但西方學者石康（Kenneth M. Swope）認為，不應就此低估萬曆朝的武功成就，此戰不過代表其軍事復興的完結。在他稱為「第一次東亞大戰」的萬曆朝鮮戰爭（1592–1598）中，明軍在平壤戰役（1592）展示巨大的軍事優勢，日軍自此改變戰術，不敢再在正面對抗，而朝鮮亦採用戚繼光（1528–1588）的方法重新訓練軍隊。<sup>36</sup> 戚繼光除了創建鴛鴦陣外，亦在薊鎮訓練車營，對抗北方蒙古騎兵。此後，車營一直被使用，即使在薩爾滸之戰後，當明軍重整防線時，包括熊廷弼在遼東、王

33 《明史》，第12冊，卷二七一，〈趙率教傳〉，頁6961–6965。

34 閻崇年：〈寧錦防線與寧錦大捷〉，收入氏著：《袁崇煥研究論集》，頁131。

35 清高宗認為薩爾滸之戰：「嗚呼！由是一戰，而明之國勢益削。我之武烈益揚，遂乃克遼東，取瀋陽，王基開，帝業定，夫豈易乎！……我大清億萬年丕丕基，實肇乎此！」，參慶桂等奉敕修：《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1冊，卷九九六，《高宗純皇帝實錄》，頁323–324。

36 Kenneth M. Swope, *A Dragon's Head and A Serpent's Tail: Ming China and The First Great East War*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9), 13–40、150–56、163–64、179.

象乾（1546–1630）在薊鎮，亦繼續建造戰車，對抗機動力極強的騎兵。<sup>37</sup>

### （一）孫承宗建立車營及其弱點

孫承宗認為明軍可以倚靠火器壓制敵騎的衝擊，所以建立車營作為收復遼東的主力。<sup>38</sup> 早在天啟二年，孫承宗便強調「中國之長技，半在炮車」，要求酌量徵調擅長使用炮車的西北兵，加入遼東軍隊中。他相信車營可以「當陣破胡馬之衝突，唯是銃炮輪番、馬步更迭」，<sup>39</sup> 贊畫茅元儀（1594–1630）亦有同樣看法，更形容「虜雖伏，當急圖大戰，大戰非車營不可」，視車營為對抗後金軍的唯一法寶。<sup>40</sup>

孫承宗組建的車營，由戰車、步兵、騎兵、輜重車營及水營組成，近人孔德騏已有專門論述。<sup>41</sup> 而孫承宗編制的車營中的騎兵，可分為附屬在車營下的騎兵及由督師直接統領的機動部隊——督師部領車營兩類。前者主要協助戰車、步兵作戰，而後者則是預備部隊，戰鬥力特別強，是車營中最精銳的部隊，但兩支騎兵都是負責支援。在〈車營百八答〉中，孫承宗多次提及，騎兵在臨陣時應該執行的任務。如車營渡河時，應該打探敵軍的來路，預先埋伏騎兵設疑陣掩護。又如通過山險時，應該要調查地形的幽暗處，派騎兵堵截敵人的伏兵，使車營順利行進。<sup>42</sup> 在孫承宗的定位中，騎兵只是輔助，負責轉移對方視線或清除伏兵，保護行進中的車營。因為車營擁有重型火器，並有步兵協同作戰，所以擔任攻擊主力，而明軍騎兵不如敵騎，當然要圍繞車營作戰。

37 周維強：〈明代戰車研究〉，頁 369–394。

38 周維強：〈明代戰車研究〉，頁 399。

39 孫承宗等撰，李紅權輯錄點校：《孫承宗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 年），中冊，〈量調大將疏〉、〈部署大將疏〉，頁 822、842–843。

40 茅元儀：《督師紀略》，卷七，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史部第 36 冊，頁 365。

41 孔德騏：《車營叩答合編淺說》（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 年），頁 250–298。

42 孫承宗等撰，李紅權輯錄點校：《孫承宗集》，下冊，卷四十三，〈車營百八答〉，頁 1264、1266。

然而，孫承宗的建軍情況並不理想。天啟四年，孫承宗上奏其計劃，準備訓練二十四個馬營及步營，合併為車營，總共 92,856 人，步兵佔 41,856 名，騎兵 51,000 名，全軍將有 63,913 匹戰馬。<sup>43</sup> 但孫承宗於次年下臺時，只訓練了十二座車營，當中 50,000 名是弓弩、炮手，而騎兵僅有 12,500 名，與目標中的 51,000 名有很大的差距。<sup>44</sup>

事實上，車營面對後金軍時，並沒有甚麼優勢。首先，車營的武器未能壓制敵人。火器是車營對抗制騎兵衝鋒的武器，但後金軍亦有所防範。第一是使用楯車，楯車其實是雙輪車，車上有數寸厚的木板，上面覆蓋鐵板及牛皮，足以抵擋矢石、火銃的攻擊。在寧遠之戰中，明軍最終要發射西洋火炮及投擲燃燒性火器「萬人敵」，<sup>45</sup> 才摧毀楯車。<sup>46</sup> 第二是鍛造堅硬的防具，徐光啟（1562–1633）就指後金軍的盔甲、面具、臂手，甚至是馬匹的護甲，全部由精鐵製造，弓矢、鳥銃無法打穿，<sup>47</sup> 當中後金軍的精銳部隊「鐵頭子」，更身披兩重鐵鎧，戰鬥力驚人。<sup>48</sup> 另一方面，後金軍的作戰模式亦與蒙古騎兵不同，熊廷弼曾經作出比較，形容其戰法是：

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披重甲，騎雙馬衝前，前雖死，而後乃復前，莫敢退，退則銳兵從後殺之。待其衝

43 孫承宗等撰，李紅權輯錄點校：《孫承宗集》，下冊，卷三十二、三十七，〈與各衙門協力奮力疏〉、〈復命疏〉，頁 987、1094–1095。

44 孫承宗：〈督理事宜序〉，卷十一，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集部第 164 冊，頁 211。

45 「萬人敵」是用泥做成球狀，上留小眼，裡面填充火藥，外圍木框。敵人攻城時，便點燃引信，將其拋擲城下，火力衝騰，八面旋轉，燒殺敵人和馬匹。劉秋霖：《中國古代兵器圖說》（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397。

46 范景文：《戰守全書》，卷十二，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子部第 36 冊，頁 455。

47 徐光啟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上冊，卷三、六，〈遼左阡危已甚疏〉、〈破虜之策甚近甚易疏〉，頁 108、282–283。

48 據《頌天臚筆》記載「天啟六年正月，奴酋大舉渡河，眾至數萬，其最勁者，人被鐵鎧二重，號鐵頭子，驚悍尤不可當」。參金日升輯：《頌天臚筆》，收入《續修全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439 冊，卷 23，頁 685–686；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袁崇煥守寧遠〉，頁 41–42。

動我陣，而銳兵始乘其勝。一一效阿骨打、兀朮所為，與西北虜精銳在前，老弱居後者不同。<sup>49</sup>

這種攻擊持續衝擊對手陣形，配合「鐵頭子」的運用，讓後金軍在野戰中取得優勢，而車營卻難以抵擋這種戰術。天啟六年冬天的覺華島之役，海面結冰，明軍在冰上挖掘十五里長的戰壕，「列陣以車楯衛之」，但戰壕因下雪很快便凍合，加上欠缺盔甲兵械，被後金軍衝散陣形，明方記錄更形容「虜騎既至，逢人立碎」，結果全軍覆沒。<sup>50</sup>

## （二）袁崇煥初出遼東提倡以西洋火炮守城

初出遼東時，袁崇煥提倡使用火炮防守城池，不與後金軍野戰。天啟六年的寧遠之戰，明軍引入西洋火炮守城，完善了防守戰術，成功擊退後金的進攻。<sup>51</sup>

袁崇煥在寧遠之戰中，以西洋火炮守城擊退後金軍。據馬楚堅估計，袁崇煥能夠劃時代地運用西洋火炮，與其出身及徐光啟有關。<sup>52</sup> 明廷自澳門引入 30 門西洋大炮，並聘用葡人訓練炮手。當中 11 門火炮調往山海關，而受訓練的彭簪古亦在戰前，力主把火炮調入城內防守。寧遠城四角的方形炮臺「皆照西洋法改之，形如長爪，以自相救」，三面突出城外，使大炮可三面發射，城四角又可以彼此配合，形成交叉火力網。<sup>53</sup> 袁崇煥把大炮架設城上，做到「以城護炮、以炮衛城」，充分發揮西洋火炮的威力，終於打退後金軍。

49 《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1977 年），第 123 冊，卷五九〇，《神宗顯皇帝實錄》，頁 11316。

50 《先清史料》，卷十五，《三朝遼事實錄》，頁 383；勒德洪等纂修，《清實錄》，第 1 冊，卷十，《太祖高皇帝實錄》，頁 134。

51 馬楚堅：〈西洋火炮對明金態勢的改變〉，頁 164–174。

52 馬氏認為有關文書、疏稿均遺佚，故無法窺見袁崇煥何以認識西洋火炮。惟袁氏乃嶺南人，游學出入廣州，而廣州又為中外貿易之地，故有機會認識西洋火炮。且袁氏見識不同北方文武，被徐光啟視為「同志」，極有可能從中接觸火炮技術。詳參馬楚堅：〈西洋大炮對明金態勢的改變〉，頁 175；徐光啟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卷十，〈復蘇伯潤柱史〉，頁 476–477。

53 《明實錄》，第 133 冊，卷六十八，《熹宗愍皇帝實錄》，頁 3270–3271。

在這場戰役中，步兵亦發揮重要作用，廣武營步卒負責守衛城內，城牆則由都司陳兆蘭、徐敷奏率領的步兵防守。<sup>54</sup> 寧遠之戰後，袁崇煥上疏請求繼續修城築堡推進防線，指出以火炮守城的重要性：

遼左之壞，雖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憑堅城用大礮一策。<sup>55</sup>

由於後金軍在野戰有優勢，所以袁崇煥認為明軍只有倚靠火炮防守城池，才能在戰爭中取勝，保住關寧錦防線。此外，他又分析後金軍的弱點，指出：

彼之遠來，利速戰；能戰之兵，又利在得戰；臣祇一味死守。令至無得與我戰，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sup>56</sup>

在袁崇煥的設想中，明軍只要專注防守城池，不主動與後金軍野戰，就能消耗敵人。當後金軍力量衰竭，明軍就有機可乘。所以，袁崇煥在寧遠之戰後，多次與後金新君皇太極（愛新覺羅皇太極，1592–1643；1626–1643 在位）進行約半年的交涉，和談最終因議和條件不相容而失敗，但明廷則利用議和時間，派兵搶築錦州、中左和大凌河三城，進一步推前關寧錦防線。另一方面，袁崇煥亦以吊喪議和為名，派遣僧鎖南等到後金，打探對方的情報。<sup>57</sup>

54 《先清史料》，卷十五，《三朝遼事實錄》，頁 384。

55 《明史》，〈袁崇煥傳〉，第 12 冊，卷二五九，頁 6710–6711。

56 《袁崇煥集》，卷一，〈師老敵張任重事巨疏〉，頁 50。

57 神田信夫（Kanda Nobuo）：〈袁崇煥與皇太極的往來書信〉，收入閻崇年、呂孟禧主編：《袁崇煥學術論文集》（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116–126；林延清：〈袁崇煥與明金議和〉，收入《袁崇煥學術論文集》，頁 127–138；李光濤：〈清人入關前求款之始末——兼論袁崇煥、陳新甲之死〉，收入《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頁 511–514。

### （三）袁崇煥在寧錦之戰使用騎兵

然而，後金軍沒有坐以待斃，讓明軍繼續修城築堡推前防線，更開始使用圍困戰術，迫使明軍野戰。美國籍傳統中國軍事史家龍沛（Peter A. Lorge）就指出，一支軍隊在明代要攻陷一座堅城，必須使用長期圍困的戰術。<sup>58</sup> 天啟七年（1627）的寧錦之役，後金軍強攻錦州不下，於是採取圍困戰術，引誘明軍來援，再調集主力進攻寧遠城。在錦州的守城戰中，火炮再次發揮重要作用，明軍「用火炮、火罐與矢石打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sup>59</sup> 當錦州被包圍時，袁崇煥上疏請求援軍時，判斷後金軍會改變戰術：

萬一錦不存，則寧必受兵。寧攻未必輒下，但恐其反客為主，于瀋陽遞番往來攻困。<sup>60</sup>

所謂「於瀋陽遞番往來攻困」正是圍困的戰術，如果一直據守城池，而沒有辦法解圍，始終會彈盡糧絕，所以明軍不能只顧防守城池，避免與後金軍野戰。而袁崇煥亦在此役使用騎兵，與後金軍連番野戰，是其軍事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袁崇煥首先派出騎兵支援錦州，避免落入後金軍的圈套。當時，明軍正在錦州、大凌河、右屯等地築城，推前關寧錦防線。天啟七年5月，皇太極即時出兵反制，包圍錦州城，解圍成為明軍的最迫切問題。而袁崇煥保持清醒，斷定對方希望明軍傾巢而出，方便在野戰中一舉殲滅，所以只派兵繞道從後襲擊。16及22日，滿桂（1594–1630）兩度率軍出援，與敵軍發生小規模交戰，雖然沒

58 Peter A. Lorge, *The Asian Military Revolution: From Gunpowder to the Bomb*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73.

59 《先清史料》，卷十七，《三朝遼事實錄》，頁424。

60 沈國元：《兩朝從信錄》，卷三十四，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56冊，頁768。民國學者張伯楨（1877–1946）亦認為「此疏可謂知己知彼，其後清朝困降祖大壽於錦州，即用此法也」。參張伯楨：〈袁崇煥傳〉，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第261冊，頁598–599。



有成功解圍，但起了騷擾作用。<sup>61</sup> 後金軍在圍困錦州的同時，亦等待明廷援軍，希望在野戰中殲滅明軍。而袁崇煥只派騎兵出援，就是希望利用其機動力發動奇襲，避免落入後金的圈套。

及後，袁崇煥還利用騎兵在寧遠城下，阻擋後金軍騎兵的衝擊。（參圖一、二）28日，皇太極親自率領大軍進攻寧遠城。明軍方面，袁崇煥決定出城迎戰。首先派出車營都司李春華率領1,200名車營步兵，出城挖掘戰壕，排列戰車為營，並預備火器準備守衛。這支部隊率先受到滿洲行營兵及蒙古兵的攻擊，明方指成功擊退後金軍，而後金則聲稱在短時間內，把車營步兵全數殲滅，兩個記載截然不同，但這次只是初戰。明軍把主力部署在城東二里，由滿桂、尤世祿（1643年卒）率領，背靠城牆再阻止後金靠城攻打。先橫列槍炮接戰。這場戰鬥非常激烈，後金指皇太極：

親率貝勒阿濟格與諸將、侍衛、護軍等疾馳進擊。明前隊騎兵不能擋，敗走，追至寧遠城下，盡殪之，屍填壕塹。諸貝勒皆愧奮，不及胄，亦馳而進，分擊明步卒。明軍大敗，委棄甲仗及士卒死傷無算。我軍乃還。<sup>62</sup>

明方則指：

滿桂以錦州被困發兵鼓勇前進。奴部執五色標旗於灰山、窟窿山、首山、連山、南海分九營，官兵撤進濠內，周圍安營。有總兵孫祖壽、副將許定國在西門紮營。桂令副將尤世威嚴整火器預備，望見城東灰塵蔽天，賊兵分投前來圍城。桂即親督紅旗，督率各營將領等官，祖大壽等

61 《袁崇煥集》，卷一，〈議策援宜疏〉，頁118；《明實錄》，第133冊，卷八十四，《熹宗愍皇帝實錄》，頁4104；《先清史料》，卷十七，《三朝遼事實錄》，頁421；《清實錄》，第2冊，卷三，《太宗文皇帝實錄》，頁47-48；《先清史料》，卷一，《山中聞見錄》，頁49；參閻崇年：〈寧錦防線與寧錦大捷〉，收入氏著：《袁崇煥研究論集》，頁139-140。

62 《清實錄》，第2冊，卷三，《太宗文皇帝實錄》，頁48-49。

迎敵，賊傷無數。賊抬屍至雙樹堡西焚燒，桂被賊射中數箭，桂馬與尤總兵馬亦被射傷。各將安設紅夷、滅虜等炮，將東山坡上奴賊大營打開，賊死數多。自卯至午，賊見我兵力戰不能得前，撤兵東去。<sup>63</sup>

雙方都聲稱獲勝，但對戰鬥的描述有很大差異。然而，據學者李光濤的研究，清人在明清戰爭中所謂的「野戰之長」，往往有些不盡然。他們對於失利，無論早期或晚期，官書或私家著作，都是每每諱而不說。在《明史》的〈袁崇煥傳〉提及這場戰鬥時，清人亦只是以「大軍亦旋引去」交代，都可反映後金軍未能在戰鬥中取勝。<sup>64</sup>後金聲稱輕鬆擊敗車營，沒有提及被火炮攻擊，將焦點放在與明軍近身戰上。而後金的記載亦顯示，明軍的布置是騎兵在前，步兵在後。明廷認為己方能夠打退後金軍，全靠各兵種緊密配合。明軍在城上安設「紅夷」、「滅虜」等炮炮擊後金軍，「將東山坡上奴賊大營打開」。而滿桂、尤世祿則率兵與敵軍肉搏，終於取得勝利。指揮此役的袁崇煥更大讚由滿桂領導的騎兵、步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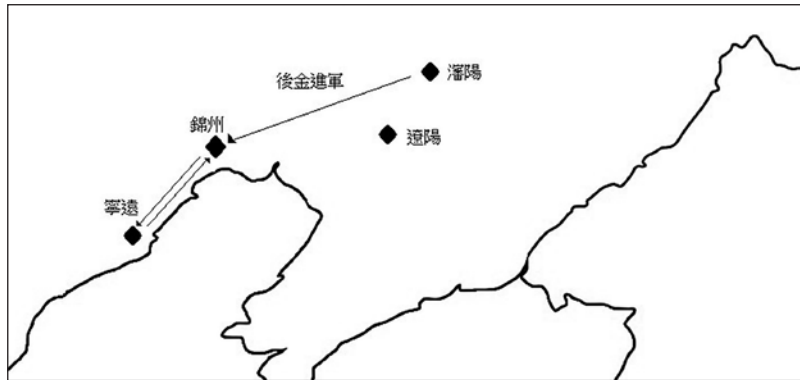
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合馬交鋒今始一刀一槍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驃悍。職復憑堞大呼，分路進追，諸軍忿恨，此賊一戰挫之，滿鎮之力居多。<sup>65</sup>

當中的「合馬交鋒」、「一刀一槍拼命」，都是描述明軍的騎兵、步兵與後金軍近距離格鬥的英勇表現。此前，車營無法抵擋敵騎的衝擊。但袁崇煥指揮的明軍在寧錦之役，使用騎兵與步兵合力阻擋後金軍騎兵的衝鋒，加上火炮掩護，終於取得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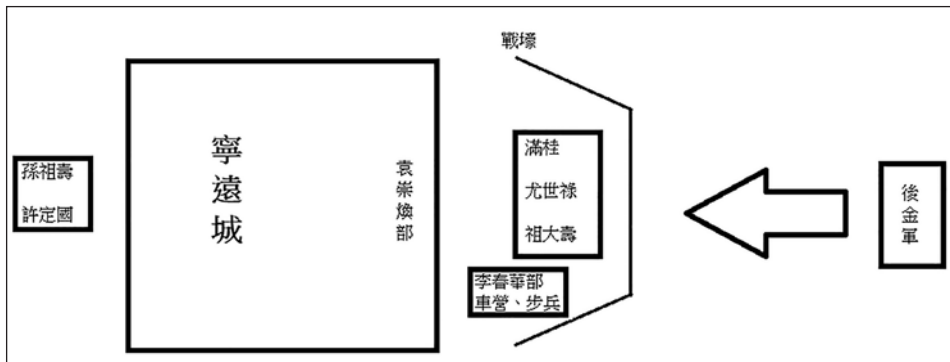
63 《先清史料》，卷十七，《三朝遼事實錄》，頁 422-423。

64 李光濤：〈清人入關前之真象〉，收入《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頁 114-115、123-125；《明史》，〈袁崇煥傳〉，第 12 冊，卷二五九，頁 6712。

65 《先清史料》，卷十七，《三朝遼事實錄》，頁 422-423。



圖一：寧錦之戰圖



圖二：寧錦之戰中寧遠城下戰鬥圖

#### 四、袁崇煥大力建設騎兵及其在明代軍事史的意義

復出遼東後，袁崇煥因應明金戰爭的形勢發展，積極建設騎兵。寧錦之戰後，袁崇煥被魏忠賢（1568–1627）黨羽以「不救錦州為幕氣」抨擊，最終辭職回鄉。次年，明思宗即位，銳意振興明朝，誅殺魏忠賢後，重召袁崇煥，負責遼東戰局。由於孫承宗創建車營時，戰略目的在於整頓遼河以西的混亂局面與收復失地，因此採取防守導向。當袁崇煥執掌遼東軍政後，遼河以西的形勢已經穩定，於是大力發展騎兵成為軍中主力，配合步兵、車營作戰，轉守為攻，其奏章少有再提及火炮。

此外，遼東車營的士氣下降，戰具亦受損。孫承宗離任後，

遼東明軍由高第（1641年卒）負責指揮。當時禮科給事中張惟一（1645年卒）曾經上奏，誣指孫承宗建立的車營只能運糧，在戰場上近乎沒有作用，明熹宗下令高第要「痛加釐革」。<sup>66</sup> 結果高第「大反承宗政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sup>67</sup> 另一方面，遼東車營的戰具也有損壞。寧遠之戰後，薊遼總督王之臣也指山海關的戰車，超過一半已經腐朽，不能運載兵器。<sup>68</sup> 由此可見，孫承宗離任後，遼東車營的戰具受損，促使袁崇煥發展其他兵種。

再者，袁崇煥獲得明思宗的支持，可以按實際情況調整。因為取得寧遠及寧錦之戰的勝利，明思宗對袁崇煥抱有極大期望，應允讓戶部、吏部、工部、兵部配合其需要，更賜尚方劍，便宜行事的權力。<sup>69</sup> 得到思宗的支持，袁崇煥便有足夠權力、資源，建設遼東明軍的騎兵。當袁崇煥於次年要求購買馬匹時，思宗隨即下令兵部撥出二萬金。<sup>70</sup>

最後，正如前述後金軍改變戰術，迫使明軍野戰。在寧錦之役中，後金軍強攻錦州不下，一度採用圍困戰術，等待明軍來援。在後金軍意圖圍城打援的情況下，明軍必須發展野戰能力，才有機會在戰爭中取勝。

### （一）大力建設騎兵

崇禎元年，袁崇煥出任薊遼督師，建設騎兵成為主力。事實上，袁崇煥在天啟七年出任遼東巡撫時，關外明軍仍然實行孫承宗的定制，負責出戰的士兵分為步營、騎營、鋒營、勁營及水營。<sup>71</sup>

66 《明實錄》，第131冊，卷六十五，《熹宗愍皇帝實錄》，頁3076-3077。

67 《明史》，第12冊，卷二五九，〈袁崇煥傳〉，頁6710。

68 「寧遠事急，臣意關門有重兵可分一萬，則各將面面相視，此云兵少，彼云馬弱，即詢車營何在？李秉誠云：馬帥在時，營已盡廢矣。其兵不任荷戈，其車半歸朽壞矣。國家何賴此諸將為哉？」，《明實錄》，卷六十八，《熹宗愍皇帝實錄》，第131冊，頁3274。

69 《明史》，第12冊，卷259，〈袁崇煥傳〉，頁6713。

70 汪楫：《崇禎長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1967年），卷十一，崇禎元年七月甲申，頁637。

71 《袁崇煥集》，卷一，〈汰兵布置疏〉，頁30-31。

然而，有了寧錦之役的經驗，袁崇煥復出遼東後，力主大力建設騎兵，上奏要求明廷不要吝嗇金錢購買馬匹：

今關內外不乏戰士，惟乏壯騎，即萬分匱乏，亦不宜省萬匹之馬價，強弱成敗，機懸於此。<sup>72</sup>

他首次指出明軍有沒有足夠的「壯騎」，影響明金爭奪遼東的勝負。在何可綱的協助下，袁崇煥首先裁革多餘軍制，使關外明軍由征遼前鋒將軍統領，每年節省 120 萬軍餉，減輕明廷的財政壓力。<sup>73</sup> 他同時要求調集款項，在西邊各市口購買一萬匹馬，獲得崇禎帝批准。<sup>74</sup> 按照袁崇煥的設計，關外明軍分為五部，總共二十四個營，騎兵佔了當中十五個，成為軍中主力，步兵、車營、水營則各佔三個，變成輔助部隊。對於這樣的安排，袁崇煥解釋：

遼東，戰衝也，騎地也，故設騎兵，而中、前、後、左、右五部，每部三營，三營之中，以一參將，領二游擊。<sup>75</sup>

因為遼東是「戰衝」，而關寧錦防線所在的遼西走廊，其平坦地形更適合騎兵作戰，所以袁崇煥建設騎兵成為主力。即使是靠近朝鮮，負責牽制敵人後方的皮島，袁崇煥在整頓兵力時，也設立十個騎兵營及五個步兵營，意圖非常明顯。<sup>76</sup> 騎兵不再與步兵混合編組，而是獨立成營，成為軍隊的重心。

針對此前騎兵的建設未如理想，袁崇煥亦積極增加戰馬數量及添置防具。次年，袁崇煥報告軍力，關寧錦防線的明軍總共有 153,182 名士兵，擁有 81,603 匹馬。<sup>77</sup> 雖然現有資料未顯示遼東明軍

72 袁崇煥上奏說，參《袁崇煥集》，卷二，〈西虜邊情兼陳禦敵方略疏〉，頁 157。

73 《明史》，第 12 冊，卷 271，〈何可綱傳〉，頁 6965。

74 汪楫：《崇禎長編》，卷十一，崇禎元年七月甲申，頁 637。

75 《袁崇煥集》，卷二，〈軍事措置疏〉，頁 162-163。

76 《袁崇煥集》，卷二，〈東江善後處理疏〉，頁 209-210。

77 《袁崇煥集》，卷二，〈遼東四鎮定糧餉疏〉，頁 210。

實際有多少騎兵，但較孫承宗的原定計劃增加近兩萬匹，估計騎兵及備用馬匹數量都有所增加。袁崇煥更請求工部重新製造盔甲、器械，增強明軍的近身防衛力，為日後的戰鬥作好準備。<sup>78</sup> 另一方面，袁崇煥亦未忽視其他兵種，在當年八月便上請發綿甲給步兵，減輕敵軍弓矢的殺傷力。<sup>79</sup>

此外，袁崇煥亦平息寧遠兵變，整頓遼東明軍軍紀。崇禎元年四月，寧遠城的川、楚士兵因欠發四個月薪餉而譁變，其餘十三營響應。他們將巡撫畢自肅（1569–1628）、總兵朱梅縛於譙樓上，並毆打畢自肅至重傷。幸好，兵備副使郭廣趕到緊急發放 7 萬金才贖回，但畢自肅事後自殺。袁崇煥抵達後與郭廣合謀，處斬知謀中軍吳國琦及 15 位煽動者，責罰參將彭簪古，罷免都司左良玉（1645 年卒），將首惡楊正朝、張思順發往前鋒效力，又獎勵沒有參與兵變的程大樂部。<sup>80</sup> 及後，袁崇煥又多次請求明廷補發軍餉，避免再發生同類事件。<sup>81</sup>

## （二）以騎兵對抗騎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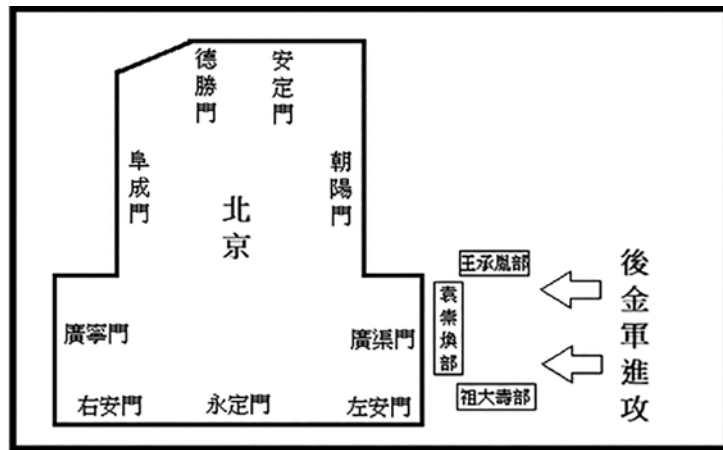
經過袁崇煥努力建設，明軍騎兵的作戰能力亦增強，崇禎二年（1629）11 月 20 日的廣渠門之戰（參圖三），甚至出現騎兵對騎兵的戰鬥。當時，皇太極因難以攻克關寧錦防線，所以於崇禎二年 10 月，繞道蒙古，從喜峰口進攻關內，並攻克遵化。後金軍更在同年 11 月直逼北京，與明廷的勤王部隊交戰。皇太極率領後金主力進攻德勝門，擊敗大同總兵滿桂、宣府總兵侯世祿（1646 年卒）的部隊。與此同時，後金軍的偏師左翼軍及蒙古軍亦向廣渠門發起進攻，因為步兵未能趕上，袁崇煥只能統率 9,000 戰騎直抵北京城

78 袁崇煥謂：「三廠所造盔甲、器械，絕不堪用，邊吏從不敢駁回內解，積習相仍，以致以卒予敵。今差游擊柳國梁呈送款式，請敕工部如式堅利」。參汪輯：《崇禎長編》，卷二十一，崇禎二年閏四月甲申丙辰朔，頁 1283–1284。

79 《袁崇煥集》，卷二，〈請給步兵綿甲疏〉，頁 209。

80 《明史》，第 12 冊，卷二五九，〈袁崇煥傳〉，頁 6714。

81 《袁崇煥集》，卷二，〈議餉疏〉、〈謝御前發餉疏〉，頁 154、159–160。



圖三：廣渠門之戰圖

下，分祖大壽、王承胤、袁崇煥三部，組成「品」字形陣迎戰。後金聲稱：

莽古爾泰等，未率大軍同行，止以護軍，及蒙古兵二千往。見寧遠巡撫袁崇煥、錦州總兵祖大壽兵二萬，屯沙窩門外。莽古爾泰分兵為三隊，令纛額真等率護軍前進。令阿巴泰、阿濟格、多爾袞、豪格繼進。時敵於右偏伏兵甚眾，因約我軍入隘口，宜趨右偏，不趨右偏而由正路入者罪與避敵同。攻入隘口，豪格獨趨右偏，敗其伏兵，追殺至城壕。餘三貝勒不趨右偏，由正路入，擊敗敵兵，亦追殺至城壕。正白旗纛額真康古禮未至城壕，止於中途。多鐸以年幼，與莽古爾泰留後，值明潰卒來犯，兩貝勒追殺之。又有敵兵一隊，距城稍遠，屯樹林內，遂令左翼蒙古各旗往擊。額駙恩格德爾貝勒巴克率扎魯特喀爾喀部落諸貝勒兵，不俟整隊徐行，驟馬而進，與敵兵接戰，遂敗歸。巴克什吳納格及外藩扎魯特部落，貝勒色本、馬尼，突入迎戰，始擊敗敵兵。<sup>82</sup>

<sup>82</sup> 《清實錄》，第2冊，卷五，《太宗文皇帝實錄》，頁81。

雖然後金軍聲稱取勝，但亦承認出現失誤，一度被明軍擊敗。而明方記載則指後金軍兵分六路，首先向東南進攻，被祖大壽擊敗而北撤，但王承胤軍沒有向前夾擊，反而往南後退與袁崇煥合兵，導致對方向西反攻。雙方的戰鬥非常激烈，袁崇煥也險些被砍中，幸好祖大壽領軍支援，在兩路夾擊下，後金軍不支撤退，明軍追殺至運河。整場戰鬥持續數小時，明軍死傷數百人。<sup>83</sup> 而朝鮮的謝恩使李忔（1568–1630）亦指全賴袁崇煥、祖大壽的指揮，明軍成功擊退後金軍。<sup>84</sup> 後金亦在戰後處罰所有參戰將領，追究戰鬥失利的責任。<sup>85</sup>

相較上次寧遠城下的戰鬥，明軍騎兵面對的形勢更加凶險。首先，他們倉促入援，兵力只有 9,000 人，沒有足夠時間準備，如在陣前挖掘戰壕，緩減對方的衝擊。其次，沒有城上火炮的掩護，但明軍利用地形設伏，分割對方陣形，再發動攻擊。而且，袁崇煥還定下軍規，不許將士割取敵軍首級計算功勞，只可以全力拚殺，務必全殲敵軍。<sup>86</sup> 難怪部分明方的記載，誇張地形容後金軍在廣渠門之戰後，發出「十五年來未嘗有此勁敵」的驚歎。<sup>87</sup>

然而，袁崇煥本來是想以步兵、車營支援騎兵拒敵。在廣渠門

83 周文郁指：「二十日早，報奴大隊分六股西來，公傳令開營迎敵。……而公正在布陣，其祖帥正兵鎮南面，副將王承等列西北，公與余紮正西，闕東面以待敵。奴擁眾直突東南角，我兵奮力殊死戰，奴奔北，見前處有承等兵，方立馬無措，若承等合力向前，則奴已大創，不意承等徒陣南避，翻致奴眾復回，徑闖西面。一賊掄刀砍值公，適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對而折。公或免。時賊矢雨驟，公與餘兩肋如蝟，賴有重甲不透。得南面大兵複合，賊始卻。我兵亦倍奮砍殺，遊擊劉應國，羅景榮，千總竇浚等，直追賊至運河邊。賊忙迫擁渡，冰陷，淹沒者無數。此一戰也，自午至酉，鏖戰三時，殺賊千計，內傷東奴偽六王子，及西虜名首都令。我兵亦傷亡數百」，參周文郁：《邊事小紀》（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年），卷一，〈遼師入衛紀事〉，頁 109–114。

84 李忔指：「軍門領諸將及一萬四千兵向西路，……賊直到沙窩門。袁軍門、祖總兵等自午至酉，鏖戰十數合，至於中箭，幸而得捷，賊退兵三十餘里。賊之得不攻陷京城者，蓋因兩將力戰之功也。」參《袁崇煥資料集錄》，上冊，卷二十二，《李朝仁祖實錄》，頁 170。

85 《清實錄》，第 2 冊，卷五，《太宗文皇帝實錄》，頁 80–81；周文郁：《邊事小紀》，卷一，〈遼師入衛紀事〉，頁 109–114。

86 周文郁指：「蓋九邊尚首虜，每以爭割首級誤事。公深鑑陋規，於未戰之先，與諸將士約，惟盡殲為期，不許割級，故將士得一意剿殺，以獲此勝。」，參周文郁：《邊事小紀》，卷一，〈遼師入衛紀事〉，頁 114。

87 《袁崇煥資料集錄》，下冊，〈漩聲記〉，頁 123。



之戰用騎兵對抗敵騎，袁崇煥表明是情況危急，不得已為之，「獲此一捷，實出意外」。同月 26 日，後金軍轉攻左安門，雙方互有殺傷。皇太極聞訊後趕到，見袁崇煥、祖大壽豎立柵木防守，於是放棄進攻，回軍屯駐於南海子。29 日，袁崇煥採用向導任守忠的建議，「以五百火炮手，潛往海子，距賊營里許，四面攻打」，偷襲後金軍，皇太極隨後退出南海子。此時，袁崇煥正等待步兵趕來，沒有大舉出擊。從廣渠門之戰後的部署來看，袁崇煥明顯是以車營、步兵支援騎兵作戰，對抗後金軍騎兵的衝鋒。<sup>88</sup>

### （三）袁崇煥在晚明軍事史的地位

袁崇煥調整騎兵與車營的角色，積極建設騎兵成為軍中主力，以車營為輔助，於明代軍事史研究中，卻少有被注意，實在可惜。事實上，袁崇煥整建遼東明軍，有三大意義，第一是改良前人的軍事遺產，第二是影響了晚明遼東的軍事發展，第三是提升明軍在戰場上的表現。

首先，袁崇煥補救了車營難以對抗騎兵的弱點。後金軍擁有堅硬的防具，其騎兵亦有強大的衝擊力，明軍只以車營迎戰，顯然沒有足夠能力抵抗。在幾場戰役中，袁崇煥雖然使用騎兵作戰，但同時亦安排車營、步兵支援，以騎兵、步兵在前拼殺，車營在後發射火器打擊敵軍。當錦州城被包圍時，袁崇煥便提出騎兵、車營、步兵大舉出援的方案：

關外精銳已絆於錦，今只可五千，合之寧城三萬五千人，人人精而器器實，滿、孫二帥直則為前後，橫則為左右；總兵尤世祿為前鋒，臣自行勁後……往來催督連營，而馬步兵進，決一死戰。以達錦州，又合錦之兵馬奮擊，令夷匹馬不還。拼此三萬五千人以殉敵，則敵無不克。<sup>89</sup>

<sup>88</sup> 《清實錄》，第 2 冊，卷五，《太宗文皇帝實錄》，頁 81-82；周文郁：《邊事小紀》，卷一，〈遼師入衛紀事〉，頁 114-115；《袁崇煥資料集錄》，下冊，〈白冤疏〉，頁 117。

<sup>89</sup> 《袁崇煥集》，卷一，〈調兵援寧錦疏〉，頁 122。

這個騎、步並進的出戰方案，正好說明袁崇煥並沒有只用騎兵，忽視其他兵種。即使是緊急入衛北京，袁崇煥亦挑選步兵同行，打算會同騎兵作戰。由此可見，袁崇煥的原意是騎兵與步兵配合作戰，而非以騎兵單獨作戰。翻看袁崇煥的奏章資料，雖然較少提及車營及步兵，但並不等於放棄使用。在寧錦之戰中，袁崇煥便安排車營和步兵出城布陣，發射火器掩護騎兵，日後也保留了三個車營及三個步兵營。<sup>90</sup> 事實上，這種做法也得到其他官員認同，太常寺少卿仍管兵部都科給事中事許可徵在寧錦之戰時，擔心後金軍引誘明軍野戰：

且料我必救錦，將誘我兵於野戰，而用其所長，此奴之狡情也。火器雖我長技，然必車騎相倚，變化無端乃為勝算。<sup>91</sup>

許可徵指車營應該在野戰中協同騎兵作戰，明軍只有在戰場上「車騎相倚」，才能抵抗敵軍進攻，而袁崇煥的戰術部署，正是以騎兵擔任主力，車營和步兵為輔助，與孫承宗的主張不同，車營不再是軍隊的重心。從明代軍事發展史來看，袁崇煥是調整前人的車營戰術，以騎兵擔任主力，車營和步兵負責支援，改良前人的軍事遺產。

即使在袁崇煥死後，明廷亦繼續在遼東建設騎兵。在軍隊的編制上，崇禎五年（1632），山永巡撫丘禾嘉（1632年卒）計劃募集正在裁軍的東江登島的20,000名官兵加入招練營，但因人數不足，只能練兵一萬人時，便指「是必馬多步少」，訓練6,000名騎兵及4,000名步兵。<sup>92</sup> 後繼的楊嗣昌（1588–1641）亦繼續這一做法，並挑選招練營6,000人，設立中左右前後五營，並以「鐵騎營」命名，其中三營駐守關內，兩營駐關外，當其他地方有需要，就出動「騎

90 汪楫：《崇禎長編》，卷二十五，崇禎二年八月乙卯，頁1449。

91 《明實錄》，第133冊，卷八十四，《熹宗愍皇帝實錄》，頁4088。

92 汪楫：《崇禎長編》，卷五十八，崇禎五年壬申四月戊辰，頁3359–3360。

擊之兵」。<sup>93</sup> 崇禎十年（1637），遼東明軍仍然保留袁崇煥的編制，只剩下寧遠車左營、錦州車中營及松山車右營三個車營。<sup>94</sup>

在袁崇煥改革後，遼東明軍繼續是明廷最可靠的武裝。<sup>95</sup> 即使批評袁崇煥與後金和談的談遷（1594–1658）亦承認「其所練甲士稍精強，邊備未嘗弛，故誅後而祖大壽猶得以餘威振於邊」。<sup>96</sup> 崇禎四年（1631），明廷在大凌河築城，推前關寧錦防線，後金聞訊後馬上出兵圍攻，爆發大凌河之戰。當時，祖大壽、何可綱部被圍困在大凌河城內，皇太極多次強調他們是明軍的精銳。他在招降明總兵麻登雲、黑雲龍時說：

明人善射精兵，盡在此城，他處無有也。山海關以內，兵之強弱，我所素悉，以我思之，天若以此城畀我，則山海關即可得，天若不與，則不能得山海關矣。<sup>97</sup>

而麻登雲亦回答：「此城之兵，猶鎗之鋒也。鎗拙而柄存，何益哉？」。<sup>98</sup> 從後金君臣的對話可知，他們都認為大凌河城的部隊是明軍精銳，所以必須消滅。而後世史家也認為後金的圍困成功，以圍城打援的戰略擊敗敵方援軍，消耗明廷在關外的精銳，使其軍事實力遭受嚴重損失，更得到一大批文臣武將，是較得到一座城池更重要的收穫。<sup>99</sup> 雖然大凌河之戰，以明朝戰敗告終，但遼東明軍仍然是非常重要。崇禎七年（1634），後金軍攻入長城以內，進攻宣府、大同等重鎮，歷時三個多月。明廷在調集援軍時，宣大總督楊嗣昌便指：

93 汪楫：《崇禎長編》，卷六十三，崇禎五年壬申九月庚戌，頁 3651–3652。

94 方一藻：〈遼東巡撫方一藻題本〉，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甲編》，第九本（香港：龍門書店，1969年），頁 862–865。

95 馬社香：〈試論袁崇煥在遼東的軍事改革〉，收入《袁崇煥研究論文集》，頁 215–216。

96 談遷著，羅仲輝、胡明校點校：《棗林雜俎》（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 120。

97 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 39 冊，天聰五年七月十一日，頁 1134。

98 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第 39 冊，天聰五年七月十一日，頁 1134。

99 孫文良、李治亭：《明清戰爭史略》，頁 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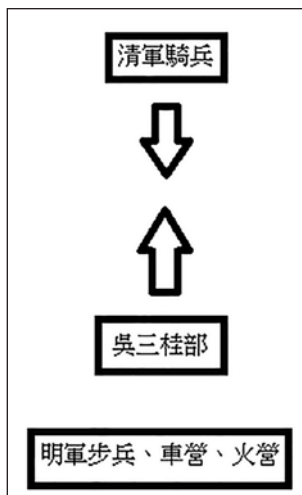
惟我關寧士馬稍成一旅，聞調即行，隨手應急，可資一臂之用。猶恐長山、大凌之後，元氣未復，彼有輕我之心，或逞強狠之力，直前搏戰厄關，或以偏師綴我，分兵深入長驅，則勝負大殊未可知。而關寧調後誰為繼者？臣等思及於此，身雖未到軍前，而心則搖搖懸旌，不知所終薄矣！<sup>100</sup>

當時的戰局已經不再局限在山海關外，明廷還需要防備關內被襲擊，楊嗣昌相信只有遼東明軍能與後金軍一戰。然而，他擔心明廷出動最精銳的遼東部隊，後金軍或會乘機進攻關寧錦防線，或分兵堵截，明廷就再沒有軍隊能出動支援。在後金軍進攻宣府、大同時，楊嗣昌認為明廷切忌催促遼東明軍浪戰，否則「必致大壞而後已」。由此可知，遼東部隊已經是明廷不可或缺的戰力。

第三，明軍繼續以車營和步兵支援騎兵。崇禎十四年（1641）四月的東西石門之戰正是一例，由於錦州被包圍，明軍派出七鎮勁旅進兵松山，自南向北布置車、火營，挑選步兵帶同弓箭、火炮，騎兵則在兩翼，準備進攻乳峰山，而清軍則埋伏兩萬騎兵迎戰。在西石門的戰鬥中，清軍出動 7,000–8,000 名騎兵攻擊，但明軍「馬步官兵拒戰甚猛」。吳三桂（1612–1678）部更發動十多次衝鋒，加上車營乘勢發射火器，清軍終於不支撤退。（參圖四）東石門的戰鬥亦非常激烈，明軍使用 20 門火炮進攻，清軍則調集 30 門紅夷大炮還擊，戰至申酉時分，清軍往北撤退。此次戰鬥可以看出，只要車營獲得騎兵的有效配合，就能發揮作用，特別是西石門的戰鬥中，清廷亦承認曾於戰鬥中一度失利，正紅旗、鑲紅旗及鑲藍旗的陣地都被奪去。而東石門的車、步營死傷頗多，除了因為要仰攻乳峰山外，騎兵專注西堵，不及掩護亦是重要因素。<sup>101</sup> 明軍取得勝利，除

100 楊嗣昌著，梁頌成輯校：《楊嗣昌集》（長沙：岳麓書社，2005年），上冊，卷六，〈封疆共事疏〉，崇禎七年閏八月十八日，頁 116–118。

101 洪承疇：〈薊遼督師洪承疇揭帖〉，收入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明清史料乙編》，第四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 310–312；勒德洪等纂修：《清實錄》，第 2 冊，卷五十六，《太宗文皇帝實錄》，頁 754–755。



圖四：西石門之戰圖

了戰術得當外，亦因為此時軍隊的士氣正盛，自身兵力約六萬，較兩萬餘清軍多。<sup>102</sup> 無論如何，東西石門之戰反映，明軍以車營和步兵支援騎兵的做法，在某些戰鬥中的確能有效對抗清軍。

尤值注意的是，後金亦在遼東爭奪戰中進行軍事改革。後金軍在寧遠、灤州之役（1630）中，體會到紅夷大火炮的威力，於是積極試鑄火炮，並將火炮及獨立成旗的漢兵交由佟養性（1632年卒）管理，建立自己的炮兵部隊，最後命名為「烏真超哈」（攜重裝備的部隊）。而吳橋兵變（1631-1632）後，孔有德（1602-1652）、耿仲明（1604-1649）的投降，更令後金得到西洋火炮及操作技術。<sup>103</sup> 學者周維強指出崇禎四年的長山之戰，後金軍由營兵在前推戰車，護軍、蒙古兵及廝卒列於後，騎兵射箭衝鋒，擊敗從錦州出援的張春部明軍，落實了明軍車騎協同作戰的思想。<sup>104</sup> 明金雙方都在戰爭中進行軍事改革，袁崇煥建設騎兵，安排車營、步兵支援，而後金

102 孫文良、李治亭：《明清戰爭史略》，頁 330-331。

103 黃一農：〈紅夷大砲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漢軍〉，《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頁 84-89；黃一農：〈吳橋兵變：明清鼎革的一條重要導火線〉，《清華學報》新 42 卷第 1 期（2012 年），頁 117-118。

104 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第 41 冊，天聰五年九月二十四日，頁 1153-1155；周維強：〈明代戰車研究〉，頁 440-441。

發展火器部隊。然而，正如學者李伯重所說，晚明的軍事改革運動雖然取得了相當成就，但這些成就是有限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改造的軍隊規模很小。<sup>105</sup> 袁崇煥整建的遼東明軍，加強建設騎兵，但在廣渠門之戰，亦只能投入 9,000 名騎兵，反映當時改造軍隊的數量有限，因此亦不能高估其建設明軍騎兵的成效。

## 五、結論

袁崇煥初出遼東效力時，向明廷引薦親友為將，要求調用廣東步兵、廣西狼兵加入遼東明軍。但寧遠之戰後，袁崇煥認同遼東人的表現，更繼承孫承宗「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主張，重用遼人為將，提倡招募遼東人參軍，並實行屯田，層層推進收復失地。

火器是明軍在戰場上的最大優勢，孫承宗亦因此建立車營迎戰後金軍。袁崇煥在寧遠之戰中，使用西洋火炮守城，擊退後金軍的進攻。及後，他又提倡修城築堡推進防線，收復失地，視西洋火炮為守衛關寧錦防線的關鍵。然而，當時的戰爭形勢不同於以往，明軍穩住遼西形勢後，下一步就要收復失地，難免要在戰場上採取主動，與後金軍野戰。另一方面，後金軍在寧錦之役開始圍城打援，迫使明軍進行野戰。因此，袁崇煥除繼續以火炮守城外，還大力發展騎兵，在戰場上亦使用騎兵，並安排車營及步兵從後支援，補救車營機動力不足，難以迎戰騎兵的弱點，改良前人的軍事遺產。在袁崇煥死後，明廷繼續在遼東只保留三個車營，遼東明軍繼續是明廷不可或缺的武裝。

袁崇煥將軍隊的重心，由車營調整至騎兵，亦正好反映東亞各國在十六世紀，雖然學習歐洲的軍事科技，但亦會按實際情況調整軍隊的部署。明軍在與後金爭奪遼東的戰爭中，一直有使用火器拒敵，並以此為核心建立車營，卻在戰鬥中接連失利。袁崇煥積極使用騎兵，以車營及步兵支援，在寧錦之戰、廣渠門之戰擊退後金

105 李伯重：《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臺北：聯經出版，2019年），頁341-342。

軍，正好說明戰爭的勝利，除了因為軍事科技技術的發展，還包括戰術的改良。學者李伯重在專著《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指，軍隊的戰鬥力生成，主要是由軍人、武器裝備以及兩者的組合方式。明代中後期不斷引進及為軍隊裝備先進火炮，而戚繼光、孫承宗等人亦組建新型軍隊來應付當時的國防威脅。<sup>106</sup> 相較於先進的武器，戰鬥方式和軍隊組織方式的變革是一項更為複雜和困難的工作，然而只有通過這些變革，才能導致軍事革命，也只有通過軍事革命，才能建立一支能夠有效使用先進武器、能夠克敵制勝的近代型軍隊。袁崇煥在孫承宗的基礎上，進一步改革遼東明軍的構建、戰鬥方式，在晚明軍事史中，是不可忽視的事件。

本文將討論焦點，放在袁崇煥如何選用遼東明軍及建設、運用騎兵上，希望能補充這方面的研究。袁崇煥在遼東效力期間，其建軍思想逐步改變。他雖然沒有留下軍事著作，卻調整軍中兵種比例，在戰場上以車營和步兵支援騎兵，值得後世重新審視其於明代軍事史中的地位。

106 李伯重：《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頁 180、317-339。

## 引用書目

Andrade Tonio. *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東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編，楊寶霖輯校：《袁崇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范景文：《戰守全書》。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第12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明清史料乙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黃國強、譚紅兒：〈論袁崇煥的軍事思想與指揮才能〉。收入廣西桂苑書林叢書編輯委員會：《袁崇煥研究論文集》，頁192-205。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

黃一農：〈紅夷大砲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漢軍〉。《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頁74-105。

——：〈明末薩爾滸之役的潰敗與西洋火砲的引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9本第3分（2008年），頁377-413。

——：〈明清之際紅夷大砲在東南沿海的流布及其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4分（2010年），頁769-832。

——：〈明清獨特複合金屬砲的興衰〉。《清華學報》第41卷第1期（2011年），頁73-136。

——：〈吳橋兵變：明清鼎革的一條重要導火線〉。《清華學報》新42卷第1期（2012年），頁79-133。

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

金日升輯：《頌天臚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孔德騏：《車營叩答合編淺說》。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
- 神田信夫（Kanda Nobuo）：〈袁崇煥與皇太極的往來書信〉。收入閻崇年、呂孟禧主編：《袁崇煥學術論文集》，頁116-126。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 勒德洪等纂修：《太宗文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李伯重：《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年。
- 李光濤：〈清人入關前之真象〉。收入東莞市政協編，羅志歡編選：《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頁114-155。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
- ：〈清人入關前求款之始末——兼論袁崇煥、陳新甲之死〉。收入東莞市政協編，羅志歡編選：《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頁507-56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
- 李洵：《下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 林延清：〈袁崇煥與明金議和〉。收入閻崇年、呂孟禧主編：《袁崇煥學術論文集》，頁127-138。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 劉伯涵：〈袁崇煥與孫承宗〉。收入廣西桂苑書林叢書編輯委員會：《袁崇煥研究論文集》，頁233-247。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
- 劉清陽：〈試論袁崇煥「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政策在明與後金戰爭中的作用〉。收入廣西桂苑書林叢書編輯委員會：《袁崇煥研究論文集》，頁635-664。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
- 劉秋霖：《中國古代兵器圖說》。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 Lorge, Peter A.. *The Asian Military Revolution: From Gunpowder to the Bomb*.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羅炳錦：〈天啟朝袁崇煥人際關係的變化〉。收入東莞市政協編，羅志歡編選：《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頁391-414。廣州：廣東

- 人民出版社，2005年。
- 馬楚堅：〈西洋火炮對明金態勢的改變〉。收入廣西桂苑書林叢書編輯委員會：《袁崇煥研究論文集》，頁156–182。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
- 馬社香：〈試論袁崇煥在遼東的軍事改革〉。收入廣西桂苑書林叢書編輯委員會：《袁崇煥研究論文集》，頁206–218。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
- 茅元儀：《督師紀略》。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3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歐陽泰著，陳榮彬譯：《火藥時代——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西歷史的一千年》。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17年。
- 慶桂等奉敕修：《高宗純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沈國元：《兩朝從信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35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孫承宗：《高陽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6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孫承宗等撰，李紅權輯錄點校：《孫承宗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
- 孫文良、李治亭：〈論袁崇煥的軍事思想〉。收入廣西桂苑書林叢書編輯委員會：《袁崇煥研究論文集》，頁165–191。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
- ：《明清戰爭史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
- Swope, Kenneth M.. *A Dragon's Head and A Serpent's Tail: Ming China And The First Great East War*.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9.
- 談遷著，羅仲輝、胡明校點校：《棗林雜俎》。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譚世保：〈袁崇煥籍貫再考辨——對《袁崇煥資料集錄》中有關問題考辨〉。收入東莞市政協編，羅志歡編選：《袁崇煥研究論文選

- 集》，頁 25–3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
- 譚世寶：〈袁崇煥籍貫補辨〉。收入東莞市政協編，羅志歡編選：《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頁 68–7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
- Wakeman, Frederic E.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 汪楫：《崇禎長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1967 年。
- 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李清田主編、刁書仁等點校：《先清史料》。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年。
- 魏斐德著，陳蘇鎮等譯，閻步克等校：《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年。
- 溫體仁等修：《熹宗愍皇帝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本，1984 年。
- 徐光啟：《徐光啟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
- 閻崇年、俞三樂編：《袁崇煥資料集錄》。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 年。
- 閻崇年：〈寧錦防線與寧錦大捷〉。收入閻崇年：《袁崇煥研究論集》，頁 125–164。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
- ：〈袁崇煥籍貫考〉。收入東莞市政協編，羅志歡編選：《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頁 11–16。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
- ：〈袁崇煥籍貫考辨〉。收入東莞市政協編，羅志歡編選：《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頁 6–10。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
- 楊寶霖：〈袁崇煥籍貫考實〉。收入東莞市政協編，羅志歡編選：《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頁 46–67。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
- 楊嗣昌著，梁頌成輯校：《楊嗣昌集》。長沙：岳麓書社，2005 年。
- 葉高樹：〈明清之際遼東的軍事家族——李、毛、祖三家的比較〉。

-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2009 年），頁 121–196。
- 葉覺邁修，陳伯陶纂：《東莞縣志》。民國十年鉛印本，1921 年。
-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 張中政：〈民族英雄袁崇煥軍事思想芻議〉。收入廣西桂苑書林叢書編輯委員會：《袁崇煥研究論文集》，頁 165–232。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 年。
-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 年。
- 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甲編》。香港：龍門書店，1969 年。
- 周維強：〈明代戰車研究〉。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年。
- 周文郁：《邊事小紀》。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 年。

# Research on Yuan Chonghuan's 袁崇煥 (1584–1630) Selection of the Liaodong Ming Arm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avalry

YUEN Chin Chung

Caritas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Previous research mostly focuses on Yuan Chonghuan's 袁崇煥 contributions in terms of military strategies rather than his army.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battle in Sarhū, Shenyang 瀋陽, Liaoyang 遼陽, Guangning 廣寧, Guangning and other important places were lost. Yuan Chonghuan went to Liaodong 遼東 in 1626, proposed to form an army with his relatives and people from the same province. However, after the Battle of Ningyuan 寧遠, Yuan Chonghuan advocated to form an army by Liaodong people. In 1628, Yuan was promoted to the marshal, and developed cavalry vigorously. This article will examine how Yuan Chonghuan organized the Ming army in Liaodong and explain the changes.

**Keywords:** Late Ming, cavalry, chariot, Liaodong, Yuan Chonghuan

